

附錄：

賭徒、鬼神與警察 花逸文……

181

——專訪胡台麗談大眾樂

冷靜觀察、熱情參與 吳錦發……

193

——訪胡台麗談台灣社會觀察

燃燒憂鬱

就在眼角瞥向橙黃落日時意外地發現了這座活生生的風車。得到兩鬢飛霜的風車主人允許，我循著梯子登上它木製黑色身軀的上端。完全不同於下午參觀的來登市鎮（Leiden）另一座靜止風車改裝的博物館！此刻一片、兩片、三片、四片風扇奮力旋轉，木屋內部彷彿地震，我立即感受到強烈生命力的躍動。

藍空尚未褪色，風扇優美地劃過，一圈又一圈……。不由得陷入暈眩、激情與狂喜中，搖搖晃晃地望出小小不規則的窗口——溶入運河水紋中的夕陽光有節奏地閃爍，推移時空。河上居然架著荷蘭古風十足的白色吊橋，時至今日，船隻經過之際它仍神妙地縮起雙臂，橋身從中斷裂撐靠兩岸。

他們來了，不知是穿越吊橋還是乘風而至，攀附風扇，仰天呼嘯。

之一

鏡片後靜定的雙眼是熾熱的，對生的渴慾。那年他的出現也很突然，從滿地可來紐約。滿地可，Montreal的奧語中譯，譯得好，充滿了進取的衝力和對未來的信心，他說。雖是舊識，其實還很陌生。大二那年我到人類學系修一門外國老師開的「政治人類學」，結果只有志明和我兩個學生。他完全以人類學系高年級高材生的盛姿在我眼前出現，我勉力追趕，自顧不暇。後來聽說他去了加拿大，對人類學狂熱不減。但唸完碩士，經歷一個生死存亡的大手術之後，不僅與相交多年的女友分手並輟學入餐館工作。

唸人類學的多少有點神經，總是假藉「參與觀察」之名，作些自己平時沒膽作的事。一九八二年的八月，不知是我帶他還是他帶我見識了紐約半夜年輕人的「新浪潮」(new wave)活動。更不知他那一換再換的心臟是如何承受近乎撕裂、瀕臨崩潰的打擊樂聲。那是一種很過癮又很迷惘的感覺，幾百個人對著舞台、對著銀幕盡情發洩。人與人的距離這麼近，可是心和眼却是平行的沒有交接點。我月底要回台灣了，他說。

「我是光棍一人鼓起『不一定非衣錦才可以返鄉』的勇氣返鄉去。我這五年

來固然勤勤懇懇幹我的體力勞動賺取生活娛樂費用，也交給加國少量的所得稅，但總是不能忘情自己以前有興趣、也嚐試著努力學習過的事務和學問，也覺得我大約有點能力對學術文化事業有些許貢獻。這次回台是看能否找到和文化事業有關的工作，考驗一下自己的能力，最低調嘛，也乖乖的在潮州鄉下住一段時間，儘量多學多問，寫點感想之類的東西。至於別的可能意外收穫，譬如遇上一個讓我神魂顛倒也對我頗有意思的女子之類的，那是題外之義，獨身活到今日也不必多存妄念了。」志明再來信補充說明。

一張又一張活頁紙邊緣留著凹突不齊的齒孔，我捧讀時像是觸摸到他起伏不定的心情。他返台三日前は「處在一種精神高度亢奮的狀態中，隨手碰摸報章雜誌書籍都覺得其內容可為心裡想的一些事情作佐證。」Arthur Koestler一九四三年寫的一篇「悲觀者同盟」特別打動他。「作者希望對長遠的局勢發展樂觀而對短暫的眼前時局悲觀的人積極聯合起來作些點滴的、看似卑微的累積工作。先把希望有什麼『根本解決』的想望埋藏起來，在為所謂大是大非而作殊死鬥的戰場邊緣建立一些大小不一的綠洲。這些綠洲的目的是保存一些古舊的人情人性的東西；比較多的對異端的容忍性。這是在大轉變之間的中間期的知識分子可以努力，也值得努力的事情。」

「我必須在這條路上繼續前行：如果我無所事事，不研究、不探索，我會在悲慘中迷失。我一定要持續不懈……目標愈來愈明晰了，有如零亂的草稿變成素描再成為圖畫，緩慢但穩定地循序漸進……我有可發揮的長才，我的生命畢竟有了目的！」一八八〇年，他決心走上繪畫之途時這樣寫著。

很想歇息。三月底的阿爾，我無所事事，也無從追索。梵谷畫過這樣的春花、類似的吊橋、隆河上的星空……於是像癡人般地去尋找，找到了什麼？

像火燭那樣燃燒我心情的是他著筆不多的白楊樹。一排又一排、粗黑蒼老結疤的主幹頂部冒出一大把用力向天空生長的細枝，上面全讓壓也壓不住的翠綠據滿了，如同鬱結的生命終於得到舒放，是陽光點燃的一束束火炬。他畫中石棺路兩旁的白楊樹却截斷了枝葉，底幹是深藍色的。

「我在外地流浪了近十年，歸根究底，我目前兩隻手掌之中除了兩隻虛妄的『孔子眼』以外就是空無一物。返鄉等於是給我自己一個在精神靈魂上重生的機會。我一向有即興衝動的毛病，今後要把這即興轉成為持久性的努力，請為我祝福。」他向不可知的未來發出懇摯的祈求。

之二

悲觀的人積極的聯合起來做點點滴的，看似卑微的業績作。先把希望有代價“根本解決”的期望埋藏起來。他們還要努力於在所謂“大事是大非而做殊死鬥”的戰場邊緣建立一些大山和一條綠洲。這些綠洲的目的是保存一些古舊的人情人性，而較多些對異端的容忍性。這是在大變遷時期，中短期內的知識份子可以努力，也值得努力的事情。這就說就更是對今日中國知識份子的說詞了。

最近我發現我處於一種精神高度亢奮的狀態中，隨手摸幾報章雜誌，都覺得其內容可為我所震動，想就一些事情做性証，也極想好好的把所振的有條理的寫出來。但時間實在不允許了，因為離回台的日子只有三天。自然可以回台後繼續努力，但回台後我還是想以多聽多看為最理智的活動。這樣子去，真的知道到底有沒有那麼一天可以最少出一本可以如“媳婦入門”比美呢！



梵高畫作「播種者」(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底)

後來才驚覺抵達阿爾的那天剛好是他的生日。可是對於一個已消逝一百年的生命，記得生日又有何意義？

那個日本女孩出現在「梵谷吊橋」邊，才二十歲，和新葉一樣青嫩，一樣急於突破生的限制與鬱悶。

「我自己存錢來這裡旅遊。我要做作家，近期早稻田文學刊登了一篇我的短篇小說。我不喜歡日本，在那裡女孩子沒有自由。可是這季節我會很思念日本，我最愛盛開的櫻花。」她來到阿爾遇見一個法國男孩，住進他家，在這個法國南部小鎮晃蕩了十天。

一八八八，他抵達阿爾時感覺到了日本，一個心靈的國度，花瓣繽紛。第一春，畫布上盡是花樹的容顏。「在這裡我看到新的事物，我在學習……」

他的母國在他生命凋謝後的一百年，特別選定在他生日這一天開啓了盛大的畫展；而阿爾這個激發他創作力的小鎮則雲淡風清，平靜地浴在陽光裡。

「我是一個激情的人，很難避免做一些事後反悔的蠢事……」他寫道。

阿姆斯特丹特展室內共懸了五幅他的自畫像。在阿爾割了耳朵以後的那幅色調最特別，他穿著綠衣、綠眼珠逼視，右耳包紮著白布，背景是刺目的紅與橘紅。事實上他割掉的是左耳！從鏡中描繪的自己左右對調，真假不分。一個更真實的

自己在畫中呈現。

他笑起來不知是什麼樣子。其餘幾幅他都穿著藍衣，在藍底襯托下露出寡歡的臉。眼睛，有時連眉毛都是藍色的。一八八九到達St Remy療養院後臉呈青黃色，像個幽靈，鬍子則似燃燒的野草。他畫自己時想要留下的是那一面相的真實？既不像「臥室」圖那樣的協調、冷靜，又不像「星夜」圖那樣的誇張、抽離現實。畫像裡面他鬱鬱地訴說生的狂想與苦悶，是芸芸眾生都承擔的平凡與不凡。他是誰？他是我熟悉又疏離的朋友。

「我對自己的作品非常、非常不滿意……十年心血的累積只是那些淒慘的、失敗的畫稿……我感覺像個失敗者。」生命結束前他曾發出這樣的感嘆。三十七歲那年，他走了。

之三

一九八七，三十八歲那年，志明走了。

他出殯那天我在高雄作田野訪問，東奔西跑，忙累得無法思考其他的事。傍晚坐進一家餐館，熱氣蒸騰中突然淚流滿面。不甘心哪！他走得那麼不甘心啊！從他返台到去世只有將近五年的時光。他是在作一場日落的演出嗎？



像火燭那樣燃燒我心緒的是阿爾的白楊樹。



「日落是一場完整的演出……把籠罩人類身體的風、寒、熱、雨等聯結成神秘的結構，使人的精神提昇……當太陽落回平靜如鏡的水面……人最能夠在一個短暫的白日夢中接受啓示……接受那些他整天暗暗的感到在他自己內部交戰不已的力量之啓示。」他翻譯這段文字時有何感觸？

去年五月，我走過大王椰趕赴一場慶祝台大人類學系成立四十週年的演講，手中緊握著五分鐘前購買的新上市的書：《憂鬱的熱帶》。李維史陀（Levi-Strauss）的情感思緒透過志明的譯筆呈現。而他在翻譯工作結束後也像落日般消逝，留給我們的是記憶，「是另外一種性質的生命」。我慎重地將書舉起，向演講廳中他的學弟妹們推薦——

在學術界中翻譯一直是一項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無論是申請研究獎助或升等，翻譯成果都不受重視。篇幅少、文字淺顯的書比較容易受到青睞，大部頭的作品即使再重要也很難找到對該學科有素養的人翻譯。

志明進入報社副刊做編輯、為原住民權益促進會催生並義務性地暫代秘書長職務、參與黨外編聯會以及勞支會的活動等我都不驚訝。但他廢寢忘食、狂熱而持續地投入人類學著作的翻譯，而且沒想到報酬，不急於出版，這種專情、近乎拼命式的奉獻作法令我動容。《憂鬱的熱帶》的中譯本將近六百頁；另一本今年才

會出版的譯作《階層人》份量更重，承擔校訂工作的恭啓有回半認真地對我說：「我想志明是翻譯這本書操勞過度而死的。」他的妻子海玲（顯然是志明返台後遇上的讓他神魂顛倒也對他頗有意思的女子）也提及那種不眠不休、異於常人的譯書情況。一直到這兩本書譯完，他才拖著疲累不堪的身子入院，準備面對生命中第三次換心臟瓣膜的大手術。

我後知後覺，聞訊趕到醫院時他已昏迷不省人事。我不死心，想把他喚醒。插入鼻孔的管子猛力抽搖了一下，我確信他聽到了。「你不會死，我們替你活下去！」我難過得不知說什麼好。想起他常在信尾附上的祝語：「祝耕耘不輟」、「祝工作進度照計畫完成」、「祝繼續堅持妳走的路而且接續不斷有豐收」……在他完成日落演出即將沈入地平線時，我能獻上怎樣的祝福？

之四

風扇仍不停地煽動著燃燒的落日，整個來登市輝煌起來了。這個城市孕育了那個頭髮捲曲蓬鬆、鼻子突出、喜歡戴帽子，將自己以不同形貌入畫的林布蘭（Rembrandt）。他屬於十七世紀、荷蘭國勢鼎盛、向海外殖民的時代。在荷蘭的美術館除了林布蘭的畫，我最熱衷於尋找的就是那些描繪飄洋過海船隻的作品。

就是這樣的船登陸了南台灣，震驚了島上的原住民。

浮起歷史的傷感。台灣，這個為荷蘭殖民狂熱淹沒四十年的島嶼，如今在荷蘭人的記憶裡，在博物館的收藏品中幾乎找不到蹤跡。來登博物館充斥著其他荷蘭殖民地像印度尼西亞、新幾內亞的文物，那位管理員却肯定地告訴我：沒有台灣的收藏品，一件也沒有！無論是首當其衝與荷蘭人接觸的平埔部族或其他原住民族群都是面貌模糊的「野蠻人」，殖民者最關心的是如何從台灣取得珍貴的鹿皮等商品。而林布蘭時代璀璨的荷蘭文化有沒有在台灣留下痕跡？也許只有安平古堡殘餘的幾塊磚石可以回答。

一個狂熱的荷蘭畫家在荷蘭之外發揮生命的熱力；一個心跳異常的台灣人類學系學生返回台灣尋找生命共同體的脈動。志明覺得自己是原住民，投生漢族為的是贖罪。生於屏東，他聽了太多原住民的悲歌，也因此對原住民知青發起的原住民族運動付出極大的關愛。他說：「台灣人性格內似乎有某種喜歡大幹『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衝動，埋頭去做些事實上不可能有結果的事，在這路途上苦撐硬碰，似乎非常的滿足了。」台灣人的生命似乎要在島上直接燃燒，才能完全。

旅遊之意義對我而言永遠是為了透過異鄉的風情更清晰地回顧自己，為安身立命的島嶼定位。梵谷遊得並不遠，在法國小鎮他以為找到心靈嚮往的日本，結

果還是不能避免地捕捉荷蘭式吊橋入畫。到了荷蘭我只見聳立的絲柏樹而不見白楊，不由得猜測他畫中厚此薄彼可能隱含的鄉土之思。故鄉是躲在背後的熱源，間接地燃燒他的生命。

李維史陀遊得夠遠了。在憂鬱的熱帶，在巴西的南比克瓦拉族 (Nambikwar)，他和印地安人一起宿營，他寫道：

「似乎是某種永不止息的災難把這些人碾壓在一塊充滿惡意的大地上，令他們身無一物，完全赤裸的在閃爍不定的火光旁邊顫抖。……但這幅淒慘的景象卻到處充滿呢喃細語和輕聲歡笑。成雙成對的人們互相擁抱，好像是要找回一種已經失去的結合一體……可以感覺得出來他們每個人都具有一種龐大的善意，一種非常深沈的無憂無慮的態度，一種天真感人的動物性滿足，而且，把所有這些情感結合起來的，還有一種可以稱為是最真實的、人類愛情的最感動人的表現。」

可是李維史陀沿襲歐美人類學追求「科學」的傳統，他最大的樂趣還是智性的、在抽離感性經驗的層次建構普同的「心靈結構」理論模型，這是他藉以跳脫自身社會文化限制的方式。但他能跳得多遠？他不是也深情地、滿懷歉疚地認為歐洲殖民母國對他們發現的土地上原有文化之毀滅要負責任，而人類學家是贖罪的象徵。

面對來登的落日，我也想攀上風扇和逝去的對話，莊嚴地作一場日落的演出。

（原載於79年6月13日中國時報）

阿南的鄉愁·阿南的歌

要笑嗎笑未出來，要哭嗎哭無目屎。一隻失巢鳥的哀慟這麼真切地從阿南瘦小的身軀、沙啞的喉頭掙出。面對這樣的歌聲，舞台上也許連靜坐抽支煙都嫌多餘。

彩霞在高速公路上轉灰暗。「港都夜雨」一響帶動我莫名的鄉愁。張照堂說他在為雲門的「我的鄉愁·我的歌」找聲音，我說，我知道一個人，一個聲音。

如果不是洪素麗今秋過境鳥般地歸來，不是我為「大家樂」現象所迷，我不會帶她返台中婆家，不會在與阿南姻親關係疏離的現況下走入他南屯街上的音樂公司，更不會一看到他身旁放把吉他就堅邀他唱台語歌以慰遠來客的鄉愁。過去，阿南的的確確自認聲音破啞不輕易在人前開口。那晚，洪和我都被震動了。洪甚至願意放棄看乩童出示大家樂明牌的盛大場面，希望整晚聆聽阿南唱歌，並熱切